

重探張愛玲小說裏的病態身體

——以《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
《小團圓》為主*

楊佳嫻

提 要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為,疾病是內在精神狀態通過身體說出的語言,是一種自我表達。張愛玲(1920—1995)小說的文本分析車載斗量,疾病書寫在“張學”裏不是新話題。曹七巧“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形象,肺病隱喻,歇斯底里症候,或厭食症狀、子宮病變,均是學者關注焦點。總的來說,肺結核、歇斯底里、瘋狂,應該是張愛玲小說內的疾病書寫最常被論及的面向,當然,這些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裏慣見的幾種病態。而本文則希望能擴及張愛玲小說內其他尚未被論說圓滿的病體書寫。

因此,本文主要透過《花凋》裏的肺癆、《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霍亂與便秘、《小團圓》裏的厭食症與性愛疼痛,探討張愛玲小說裏的病態身體(morbid body)的三種樣貌:消耗與醜怪的身體、堵塞與自囚的身體、內傷與自棄的身體,以及其所彰顯的意義、在小說美學上的功能。談疾病書寫而格外側重身體,是因為疾病必須在身體顯現摧枯拉朽之力,才能暗示、側寫出人物的身心變化與生命困局;進一步也能探究,小說人物什麼樣的遭遇與什麼樣的疾病會被聯繫起來。借助歷史材料,並深化小說文本解讀,得以見出張愛玲小說裏所生產

* 本研究初次發表於2016年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之“疾病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幸得在場專家學者補充、指正。而兩位匿名審查人詳細閱讀後,點出粗疏不足處與可資再發揮處,亦使本人獲益良多。特此申謝。

出的病態身體,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鑲嵌於歷史、社會與性別的圖景內。

關鍵詞：張愛玲 病態身體 疾病書寫 性別

一、前 言

張愛玲(1920—1995)小說裏的“病人”不少,疾病書寫在“張學”裏也不是個新話題。《金鎖記》裏“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的七巧,拿來與西方文學“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形象連結,¹還有肺病隱喻,最常被析論的文本即是對於肺癆患者描寫較為出位的《花凋》,²另外,也有針對歇斯底里症候,³或提及厭食症狀、子宮病變者。⁴如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指出的,疾病是內在精神狀態通過身體說出的語言,是一種自我表達,⁵張愛玲也藉著病態的描寫來彰顯人物的遭遇、性格與命運。總的來說,肺結核、歇斯底里、瘋狂,應該是張愛玲小說內的疾病書寫最常被論及的面向,當然,這些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裏慣見的幾種疾病,事實上,張愛玲小說的疾病譜不僅於此,而即使是其他作家也常書寫的疾病,她的寫法也有所不同。

前行研究惠我甚多,却也同時開啓疑惑:有研究者把《心經》許小寒戀父情

-
- 1 如林幸謙:《重讀〈金鎖記〉:鐵閨閣與雙重人格的儒家瘋女》,《人文中國學報》,1998年4月,第5期,頁189—221。
 - 2 如王冬梅、孔慶林:《肺病隱喻與性別文化象徵》,《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4月,第9卷第2期,頁37—38;李蓉:《性別視角下的疾病隱喻》,《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頁14。
 - 3 如鍾正道:《佛洛伊德讀張愛玲》(臺北:萬卷樓,2012年)第3章。
 - 4 如石曉楓:《隔絕的身體/性/愛——從〈小團圓〉中的九莉談起》,《成大中文學報》,2012年6月第37期,頁195、210—213。
 - 5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年),頁56—57。

結當作“病”來看待，⁶亦有研究者將《小團圓》裏的家族亂倫，一併與其他生理疾病納入“病”的範圍，混同討論，⁷或者認定其小說內一切扭曲、傷害皆是“病”⁸——這樣看來，以表現現代人心靈困境為主的現代小說，可說是無所不病，而當一切都可視為“病”，這個概念是否就失去了分析的效力？

因此，本文為了更明確地討論文學中的疾病書寫，希望不單單關注疾病（disease），還能將重點放在寫作者如何塑造病態身體（morbid body）上，以及其所彰顯的意義、在小說美學上的功能。談疾病書寫而格外側重身體，是因為疾病必須藉由身體，方能顯現摧枯拉朽之力，才能暗示、側寫出人物的生命變化或心理情狀；進一步也能探究，小說人物什麼樣的遭遇與什麼樣的疾病會被聯繫起來，其所生產出的病態身體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鑲嵌在歷史與社會的圖景中。西方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注重病者個人體驗，視醫療為一超越身心區分的整體；現代臨床醫學興起之後，病人（sick-man）變成了病患（patient），以人為導向轉為客觀導向，整體觀讓位給針對組織層次病灶的探究。⁹而西方現代醫學知識進入中國以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與中國傳統醫學原本的體系形成不同程度的混合、過渡，¹⁰這種並存的樣態，也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疾病書寫的一部分。

魯迅自陳寫作小說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¹¹這個說法很具代表性，却不見得能完全覆蓋中國現代文學裏的疾病書寫。亦有研究者進一步釐清，文學研究會作家群是“（作家）揭出（民衆的）疾苦，（以期）引起（社

6 宮愛玲：《疾病的阻隔與愛情化石的生成——論張愛玲小說疾病書寫的美學意蘊》，《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6月，第24卷第3期，頁88。

7 周芬伶：《病恙與凝視——海派女性小說三大家的疾病隱喻與影象手法》，《東海中文學報》，2012年7月第24期，頁226。

8 易小亮：《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小說的“病”婦形象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10。論文中指出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如張愛玲等，“以她們（按：指小說內的女性人物）的病來反映女性的悲慘遭遇，這也映照出日常生活的殘酷和女性被壓抑、沒有自我的身份處境，表達女作家對於女性命運的關注與焦慮”。

9 朱申（N. D. Jewson）著、曾凡慈譯：《論醫學宇宙觀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吳嘉蓉、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出版社，2004年），頁151—182。

10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4年6月第54期，頁44—51。

11 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六）（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年），頁100。原收錄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一書。

會改革者)療救的注意”,創造社作家群則是“(作家)揭出(自己的)疾苦,(以期)引起(同道者)欣賞與療救的注意”。¹² 可是,無論是哪一種說法,若要放到張愛玲小說來談,都會產生扞格,“療救說”或“欣賞說”都不足以曲盡其內核。因此,本文期望能夠重探《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小團圓》三個作品內呈現的病態身體,並輔以張愛玲其他散文、小說,試著將其疾病書寫與當時社會脈絡、張愛玲小說所依託或對話的美學典範等面向聯繫起來。

二、反浪漫與反經典的肺病身體

蘇珊·桑塔格指出肺結核是時間之病、熱情之病,從對肉體的消耗中提煉出迴光返照般的精神之光,¹³且進一步被當作心靈纖細與感性豐富的象徵,從中突出一種自我樣貌。在十八世紀的西歐,肺結核患者削瘦蒼白的身體與頰上紅暈形成對比,成為貴族的新模型,健康則幾乎等同於野蠻。¹⁴疾病的美化意義蓋過了疾病本身,中國現代文學裏也有類似情形,如郁達夫的小說人物時常患有肺癆,同時被塑造成浪漫詩人,洋溢著因為疾病而來的強烈自覺(self-consciousness);¹⁵周作人曾解釋,郁達夫小說裏表現的苦悶是現代的苦悶,是“生的意志與現實之衝突是這一切苦悶的基本:人不滿足於現實,而復不肯遁於空虛,仍舊在這堅冷的現實之中,尋求其不可得的快樂和幸福”,¹⁶如同本文前言提及的“欣賞說”,揭出此一苦悶,既彰顯出人的自覺,復吸引同愁者的共鳴。

肺結核在中國現代文學裏頻繁現身,而現實中,肺結核特效藥在中國普及

12 黃曉華:《前期創造社疾病書寫與現代人的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3期,頁144。

13 《疾病的隱喻》,頁19。

14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6年),頁96—97。

15 郁達夫:“文人的多病,是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也可以說得通的。他的神經比常人一倍的靈敏,感受力也比常人一倍的強,所以他常常離不了‘自覺’(self-consciousness)的苦責。”見郁達夫:《“小說論”及其他》,《郁達夫全集(五)》(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190—191。

16 仲密(周作人):《〈沉淪〉》,收入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下)》(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頁307。

需待 1950 年代以後才實現，¹⁷ 作家頻繁書寫肺結核，既有美學上的需求，也具現實意義。到了張愛玲崛起於文壇的一九四〇年代，翻閱當時報刊，可以發現大量關於肺病看護、新藥研發的知識與消息，同時，肺病也仍然被視為一種文學性的形象。如形容冬天“淡淡的陽光宛如一個肺病少女的容顏，她懶散地斜倚在窗簾畔，半個身子却跌坐在地板上。慢慢地掙扎起來，沒有一聲嘆息，移動著金蓮式的步伐向屋脊”，¹⁸ 作者的修辭裏將冬日陽光女性化與疾病化，更彰顯那份單薄與矜貴；或者取樂用的風涼話專欄上，有一條是“魯迅之所以有成就，完全靠他有肺病的關係”。¹⁹ 雖然是嘲弄，却還是呼應了把肺病當靈魂病的傾向，認為這樣的病症揭示了某些精神性的東西，能與文學藝術相連。²⁰ 當時與張愛玲齊名的蘇青，則發表過冷嘲熱諷的《聽肺病少爺談話記》，描繪病人“眼中帶著憂悒”，見了女人，這憂悒就轉為興奮，且“得意地談到自己的病”，由於家境優渥，怕他療養期間失去營養，因此拼命以營養食物替他補身，導致肺病沒治好，倒是添了消化不良症；蘇青認為這是一種闊綽病，像自己這樣“窮出身的女兒”，絕對沒有“那種嬌腔”，長期療養而不工作，食物喫得太多，竟然消化不了，病菌使得富人成了廢物了；倘若是窮人得了肺結核，怕丟工作又不敢承認，只好瞞著大家繼續勞動，暗中散播病菌。²¹ 蘇青此文以她一貫的爽辣筆觸戳破肺病身體的浪漫想象：肺病患者如果要擔當得起浪漫的要求，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經濟資本。這一點可以聯繫到張愛玲《花凋》。

《花凋》主角鄭川嫦，從待嫁花樣少女變成肺病患者，拖久了變成骨癆，²² 纏綿病榻多時，最後死去。小說中雖未明言她患的是肺結核，不過，骨癆又稱骨結核，不少患者是先患了肺結核，繼發骨癆，因此，以下仍將川嫦的疾病以肺結

17 1940 年代，發現了鏈黴素可以對抗結核菌，1950—1960 年代又持續開發不同的藥物治療方式，之後在已開發國家裏結核病患者大幅減少。

18 戈散士：《冬》，《上海生活》，1944 年 12 月 31 日第 3 期第 4 版，頁 3。

19 刊載於《新東方雜誌》的“如此而已”專欄，1943 年第 7 卷第 1 期，頁 108。

20 《疾病的隱喻》，頁 31；《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 96。

21 蘇青：《聽肺病少爺談話記》，《雜誌》，1943 年 7 月第 11 卷第 4 期，頁 141—144。

22 指結核菌入侵關節或骨骼而引起的破壞性病變，患者多半是在三十歲以下，可能導致關節腫脹、疼痛、功能發生障礙，並因此而使得身體發生畸形等。

核來看待。她的疾病引發關鍵,從小說敘事來看,是和家人介紹的男友章雲藩有過初步身體接觸後:

當天姊姊姊夫陪著他們出去跳舞。夜深回來,臨上床的時候,川婦回想到方才從舞場裏出來,走了一截子路去叫汽車,四個人挨得緊緊地挽著手並排走,他的胳膊肘子恰巧抵在她胸脯子上。他們雖然一起跳過舞,沒有比這樣再接近了。

想到這裏就紅了臉,決定下次出去的時候穿雙頂高的高跟鞋,並肩走的時候可以和他高度相仿。可是那樣也不對……怎樣著也不對,而且,這一點接觸算什麼?下次他們單獨地出去,如果他要吻她呢?太早了罷,統共認識了沒多久,以後要讓他看輕的。可是到底,家裏已經默認了……

她臉上發燒,久久沒有退燒。第二天約好了一同出去的,她病倒了,就沒去成。²³

“胳膊肘子恰巧抵在她胸脯子上”的接觸到“如果他要吻她”的設想,引發“紅臉”、“臉上發燒”的生理徵象,這是對於愛的前景、性的接觸的想象,第二天川婦發燒、病倒,變成了肺病患者。可以說作者是有意將熱情(心的發熱)、發燒(身體的發熱)聯繫起來,製作一場愛的病症。

眾所周知,張愛玲深受《紅樓夢》影響。《紅樓夢》第三十四回,黛玉收到寶玉傳情的舊帕後,“不覺神魂馳蕩”、“一時五內沸然炙起”,“由不得餘意纏綿”而走筆題詩於帕上,“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却不知病由此萌起”,顯然熱情即是病因,也可以反過來說,因為內心燃燒著異樣的熱情,發作於身體上而引發了燒熱,且黛玉本來就患有不足之症,從咳血等徵兆來看應是肺癆。這裏的“病”,既可以指生理上的病,也可以指心理上的纏綿、執著,過度故為病。《紅樓夢》常提到“痴”、“病”,均指一種不為儒家價值所認可的過

23 《花凋》,《第一爐香》(臺北:皇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214。

度的情感表現。而肺結核作為文學隱喻，又與心的燃燒、身體的消耗有關，故黛玉身體淚盡燈枯，川嫦身體快速消瘦，這也使得那熱情的盼望成為烏有。

但是，張愛玲如此寫作，並非為了讓讀者將川嫦視為黛玉。張愛玲小說內秉持一貫的反浪漫(anti-romantic)態度，如《傾城之戀》裏年輕寡婦與浪蕩子的意外邂逅，看似浪漫，小說却處處彰顯女主角極為務實的考量，或《年青的時候》透過中國青年與俄羅斯女孩的語言交換課，彰顯出看似浪漫的異國男女交游，時時受到文化想象的參差、不同國族的位階高低等因素左右，且難以克服。《花凋》則意圖消解病美人的浪漫形象，加強顛覆效果：

她瘦得脅骨胯高高突了起來。他該怎麼想？他未來的妻太使他失望了罷？

當然他臉上毫無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悅——一般醫生的典型臨床態度——笑嘻嘻說：“耐心保養著，要緊是不要緊的……今天覺得怎麼樣？過兩天可以吃橘子水了。”她討厭他這一套，仿佛她不是個女人，就光是個病人。

病人也有幾等幾樣的。在奢麗的臥室裏，下著簾子，蓬著卷髮，輕綃睡衣上加著白兔皮沿邊的，床上披披的錦緞睡襖，現在林黛玉也有她獨特的風韻。川嫦可連一件像樣的睡衣都沒有，穿上她母親的白布褂子，許久沒洗澡，褥單也沒換過。那病人的氣……²⁴

“醫生的典型臨床態度”，表明了章醫生面對川嫦這位情人兼病人，既不帶有感情，也不將對方當成一特殊個體來看待；醫生與病人的社會性疏離，既可以確立醫生的權威性，也更方便將病患當作物質性存在來對待。²⁵ 川嫦感覺“討厭”，因為熱情被辜負了——她的熱情來自想象自己成為可欲望的對象，然而，當這份熱情通過身體發燒而外顯且轉渡成癆病，反倒消除了她自身的可被欲

24 《花凋》，《第一爐香》，頁215。

25 朱申(N. D. Jewson)著、曾凡慈譯：《論醫學宇宙觀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科技渴望社會》，頁178—179。

望性,在川嫦看來,章醫生那不顯差別的態度正坐實了此事。不能當女人,只能當病人,可是病人也分等級,肺病患者最美的形態——林黛玉——得要足夠金錢才能供養得起,而小說一開始就交代過的,遺少家庭鄭家最不穩固的就是經濟。

遺少家庭在現代社會裏毫無用處,父親鄭先生已然成了“酒精缸裏泡著的孩屍”,²⁶永葆青春但是行屍走肉,川嫦若想脫離這個僵死的家庭,翻身機會就是抓緊婚姻機會,藉著與國外留學歸來的西醫結婚而從“舊”社會一躍成爲“新”時代一分子。²⁷天不從人願,她病倒了才發現,不但失去由“舊”轉“新”的機會,連把自身形塑爲浪漫病人也不可能,因爲鄭家欠缺浪漫所需的經濟資本。當她掙扎著想要爲平淡生命來一次壯舉,“趴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²⁸偷溜出去再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面臨的却是“到處有人用駭異的眼光望著她,仿佛她是個怪物。她所要的死是詩意的、動人的死。可是人們的眼睛裏沒有悲憫”,²⁹肺結核並不曾如文學所昭示出來的意義那樣,將普通身體“提煉”爲詩意身體,反倒變成了動物化、醜怪、被賤斥的身體。女體與“蜘蛛”意象的結合,令人聯想到捕捉男子的盤絲洞,也能聯繫《第一爐香》裏擅長擄獲男子的梁太太面網上閃爍的綠寶石蜘蛛,可是,《花凋》裏逆寫了這個情欲意象,拿來表現去情欲化的“冷而白”形象。回溯小說開頭,“在石頭的縫裏,翻飛著白石的頭髮,白石的裙褶子,露出一身健壯的肉,乳白的肉凍子,冰涼的。是

26 《花凋》,《第一爐香》,頁 203。

27 如陳獨秀《敬告青年》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項下,指中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青年雜誌》,1915年9月創刊號,頁5。傅孟真《所謂“國醫”》一文即表現出蔑視中醫的態度,認爲不夠科學,《文化月刊》,1934年10月第1卷第9期,頁99—102。另見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社會的多個世界與“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頁77—79。文中提出,近代中國社會並非單純的新舊兩個世界,而是在歸爲“新”或“舊”的類別裏仍有細緻的區分,例如西醫一般被視爲“新”,可是西醫當中還區分爲教會體系培養出來的西醫和國外留學歸來的西醫,後者自詡更爲專業,對他們認定的“西醫中的庸醫”的容忍程度比面對中醫時還低。

28 《花凋》,《第一爐香》,頁 220。這種行動能力降低的病態,與骨癆帶來的傷害有直接關係。

29 《花凋》,《第一爐香》,頁 221。

像電影裏看見的美滿的墳墓，芳草斜陽中獻花的人應當感到最美滿的悲哀”，³⁰天使健壯却凝結的身體正是對於川嫦病體的反諷，“美滿的悲哀”應對了川嫦離家出走時所渴望得到的東西——這仍然屬於浪漫病人、詩意病體——然而，在現實中，却是當病體消逝於人們的視線裏，才可能實現。

川嫦從病到死，有研究者視之為“全家人以保護的名義使她動彈不得，自由被剝奪却又不提供她應有的醫療照顧”，追根究底，是父親鄭先生“重男輕女與性別政治的壓迫”在作祟，致使川嫦身體成為“父權文化壓抑的場所”；³¹我同意鄭先生重男輕女、不願付出更多，減少了川嫦被治癒的機會，不過，骨癆患者的關節功能障礙與神經疼痛，恐怕才是川嫦“動彈不得”的原因，而非被強加禁錮於閨閣，證諸於川嫦健康時仍能在家人陪伴下與男性出外遊樂，即可證明。以反詰父權等角度立論當然也不無道理，不過，張愛玲一直不是個標準的女性主義者，³²《花凋》在女性病態身體書寫上的意義，不妨也從非女性主義角度來考慮：第一，顯示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一家子按市場邏輯行動，家人之間也明算賬，父親在女兒久病之際顧慮的是醫療開銷太大而非不顧一切為女兒治病，且張愛玲小說本就處處提醒金錢的作用、算計之必然；第二，與肺結核在中國被視為家庭疾病（family disease）有關。

《花凋》裏確實揭示了疾病，對象是誰呢？既非文學研究社式的尋求社會改革，也非創造社式的將病體編入審美對象，反倒消解了以上二者。張愛玲塑造的女性肺病身體，無法與國族議題聯繫，也拒絕浪漫主義的收編；固然，川嫦患病後，也和郁達夫的小說人物或丁玲筆下的莎菲一樣，“疾病打破人的麻木狀態，使他的感受變得豐富而敏銳，從而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美，並用美的方法表現出來”，³³自我意識空前地膨脹起來，可是，却没有上昇為欲望渴求與

30 《花凋》，《第一爐香》，頁 202。

31 本段以上引文均出自林幸謙：《女性焦慮與醜怪身體——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亞文化群體》，金宏達編：《回望張愛玲·鏡像繽紛》（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頁 197。

32 李渝：《戒愛不戒色——張愛玲與她筆下人物》，收入梅家玲等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210。李渝指張愛玲“思路委靡”，與蘇青的對談中“談女人崇拜男人的快樂，女人早嫁的好處”，與炎櫻對談時說男子外遇，妻子忍忍就好了等，“文才如此出眾的女作家，對女性議題竟有這樣的看法，真叫人看了歎氣”。

33 黃曉華：《前期創造社疾病書寫與現代人的建構》，頁 146。

精神上的自守衝突下引發的國族或自我認同危機。疾病在現實中引發的折磨,與被審美化以後滋生的浪漫情調,彼此是衝突的,“疾病能使主體從現實生活中得以凸顯,從而獲得一種被‘顛倒’的價值:在現實生活中疾病意味著痛苦,而在藝術中疾病則意味著不同尋常”,³⁴張愛玲正是要將肺病身體藝術打回現實,力圖擺落肺結核的“意義”而正視病態身體的醜惡,³⁵消耗醜怪的身體雖然也“不同尋常”,却不是審美的對象,而這一點,也與中國現代文學裏的肺結核身體書寫的性別差異相反。³⁶

再者,肺結核在歐洲或日本,被視為是因為現代化發展而導致的社會性疾病(social disease),與公共健康的維繫有關;在中國,肺結核則被認定為家庭的疾病(family disease),肇因於“人們在龐大又親密的中國家庭中所培養出來的種種‘不衛生的習慣’”,³⁷隨地吐痰、大家庭的居住模式、飲食習慣與日常接觸上過度狎近,而導致惡性傳染,³⁸呼應的正是如傅斯年、李大釗所聲稱“家庭”乃是中國萬惡之源的說法。³⁹回溯《花凋》裏那頓得到細緻描寫的晚餐,混亂吵鬧的用餐過程、吐了一大串痰方才委曲地上桌吃飯的鄭太太、把狗叫近餐桌來好將滿腳泥巴踢上去的兒子……鄭先生有妻有妾,子女傭僕等一大串,加上欠缺秩序、衛生習慣顯著不佳,仍舊坐實了公共衛生專家所詬病的那種中國式家庭生活。⁴⁰不衛生的種種家庭細節環繞著川嫦的生活,她成為肺病患者後,却

34 同上,頁147。

35 《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99。柄谷行人指出,正岡子規《六尺病床》裏對於肺結核的描寫完全沒有浪漫派式的意象,“將痛苦當作痛苦醜惡當作醜惡承認下來”以替代“對於死的憧憬”。而川嫦就屬於充滿了“對於死的憧憬”一類的人物。

36 鄧寒梅:《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疾病敘事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67—69。在《結核病患者病相的性別差異化描寫》中指出,女性結核病人大多是病美人,而男性結核病患則往往呈現出暴力、惡臭、嘔吐等病相。

37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年12月第74期,頁139。

38 雷祥麟:《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為例》,收入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圖書公司,2013年),頁123—124。

39 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952),頁1—5。另可見守常(李大釗):《萬惡之原》,《每周評論》,1919年7月13日第30號,第四版。

40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頁47。

從那親密狎近的整體中被排除出去，“連鄭先生，爲了怕傳染，從來不大到他女兒屋裏來的”，即使來了，也要“濃濃噴著雪茄煙，製造了一層防身的煙幕”，⁴¹雖然無用，那“隔離”的企圖却很顯明，也顯示出傳染性病態帶來的恐懼。⁴²

總的來說，熱情的煎熬構成了疾病文學化的培養土壤，極有可能讓《花凋》走上浪漫化的道路，張愛玲却以不衛生的家庭環境、病態身體的真貌、欠缺金錢支持等反諷情節，瓦解了詩意病體的幻想。民國時期的中國式衛生觀裏，肺癆被認爲是太過“競逐、煩劇”帶來消耗的結果，保養之道唯有遠離現代社會的爭逐，故“養病便可能成爲最‘衛生’的、生命中最活潑的時刻”；⁴³川嫦作爲以結婚爲人生目標、社交範圍有限的現代閨秀女性，出外工作不在她與她的家庭考慮內，故不需直接面對現代社會的競逐，養病帶來的隔離感，以及試圖跨越隔離後發現的病的“真相”，也因此更具震撼力。⁴⁴

三、失禁與堵塞自囚的腹病身體

張愛玲難得描寫染上鴉片煙癮以外的男性病體。不過，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裏，佟振保的病端倒是來得迅疾而頗富象徵意味。小說描寫振保分租了朋友王士洪家裏的房間，士洪離家經商，留下對於異性向來頗富吸引力的太太嬌蕊在家；這位朋友之所以如此放心，全因爲振保素有柳下惠之名，小說開頭藉著振保在英國與混血女孩玫瑰的情緣始末，伏下了這一點。然而，嬌蕊還是與振保發生了婚外情。

小說中描寫當振保聽到嬌蕊已經去信向丈夫攤牌，承認了這樁悖德戀情，

41 《花凋》，《第一爐香》，頁 218。

42 Rene Jules Dubos, *Mirage of Health* (New York: Harper, 1959), pp. 208—211. 書中闡述了十九世紀時，肺結核被視爲能賦予它的犧牲者一種特別的精神品質 (a peculiar quality of spirituality)，健康幾乎被認定是一種粗俗品位的象徵 (a sign of vulgar taste)，然而，等到微生物學發展起來以後，這種病症的形象發生改變，成了令人嫌惡、恐懼的汗穢之物。

43 雷祥麟：《衛生爲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頁 55。

44 川嫦拖著支離病體在外面對人們不憐憫的目光，回家後又從鏡子裏發現美貌的消磨：“我怎麼會……會變得這麼難看了呢？”

簡直五雷轟頂；他立即奔到街上，感覺都市裏灰色建築們像火車衝了過來，那正是壓力的具象，接著就出現了肚痛症狀：

他在馬路上亂走，走了許多路，到一家小酒店去喝酒，要了兩樣菜，出來就覺得肚子痛。叫了部黃包車，打算到篤保的寄宿舍裏去轉一轉，然而在車上，肚子仿佛更疼得緊。振保的自制力一渙散，就連身體上一點點小痛苦都禁受不起了，發了慌，只怕是霍亂，吩咐車伕把他拉到附近的醫院裏去。⁴⁵

肚痛症狀伴隨着精神緊張，自制力不再，一點身體的小痛苦也被擴大。而他正是靠著這份自制力，逼使自己在英國留學時，面對玫瑰投懷送抱而坐懷不亂，逼使自己盡量地維繫那個“對的世界”、“做自己的主人”，符合現代中國社會對於一個有為男子的要求。霍亂之類的感染性腸胃疾病，二十世紀為範疇，在1940年代以前由於帝國主義體系下的現代性經濟擴張、鐵路發展等因素，曾在中國有過數次跨區域大流行，至1930年代仍有大規模發作情形，而上海即為主要疫區之一，至1942年仍有霍亂流行的紀錄。⁴⁶正因為上海聚集了大量為了謀生而湧入的流動人口，在衛生條件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生活，正是瘟疫的溫床。⁴⁷無論如何，振保疑心感染霍亂，精神壓力之外，有其現實基礎；霍亂感染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數小時內即腹瀉脫水死亡，慌張的反應也相當合理。

住院以後，振保必須同時應對來自母親與嬌蕊的質問。母親疑心兒子與嬌蕊有什麼首尾，當著嬌蕊的面勸告兒子：

45 《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10年），頁159。

46 巴呂德：《上海霍亂流行之研究》，《中華醫學雜誌》，1944年7—8月第30卷第4期，頁162。

47 詳細論述見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域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3月第51期，頁91—129。

吃壞了肚子事小，這麼大的人了，還不知道當心自己……巴你念書上進好容易巴到今天，別以為有了今天了，就可以胡來一氣了。人家越是看得起你，越得好好兒的往下做。王太太你勸勸他。⁴⁸

身體的病態與道德的病態在這段話裏被聯繫起來，“不知道當心自己”既是指腹痛，也是指在情欲上不懂收束。母親離開後，嬌蕊留下來做看護婦的工作，伺機想解釋點什麼，却更讓振保轉側不安，這時候，之所以轉側不安，並非因為霍亂疑雲，而是倏然發現，由於自制力鬆弛，那脫序的一面終將毀掉苦心經營的人生，這除了使他下決心與毀壞“對的世界”的誘因嬌蕊分手外，就整篇小說看，也與之後煙鸞的病症反向呼應。

振保決心娶符合他“對的世界”藍圖的女人做妻子，身家清白、性格羞縮的孟煙鸞雀屏中選。然而，煙鸞與振保魚水不睦、與婆婆相處不來，連在傭人面前也沒有一點主婦的威嚴，更沒有自己的社交天地，只能對女兒訴冤。振保聽到了，乾脆送女兒到寄宿學校去，讓煙鸞徹底陷入失語狀態，看似坐擁美滿家庭，實則在家庭內部被放逐，社會上也無處可去。這是女性的困境：郁達夫總在小說內製作男性“零餘者”形象，他們多半是家庭與社會身份的雙重失落者，可是，“女結婚員”的世界裏，家庭身份就是社會身份。⁴⁹ 當長年在家庭中壓抑過活的煙鸞生了病：

煙鸞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裏一坐坐上幾個鐘頭——只有那個時候是可以名正言順地不做事，不說話，不思想；其餘的時候她也不說話，不思想，但是心裏總有點不安，到處走走，沒著落的，只有在白色的浴室裏

48 《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10年），頁159—160。

49 如張愛玲《鴻鸞禧》裏的婁太太，儘管婚姻並不愉快，每日諸多氣惱，可是“叫她去過另一種日子，沒有機會穿戴齊整，拜客，回拜，她又會不快樂，若有所失”，因為體面的丈夫同時意味著妻子也能在社會上得到體面的地位，因此，拜訪他人時，才能“婁太太對於鬻伯的聲名地位有絕對的自信，因之依舊態度自若”。《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頁123—124。

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頭看著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皚皚的一片,時而鼓起來些,時而癟進去,肚臍的式樣也改變,有時候是甜淨無表情的希臘石像的眼睛,有時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時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裏有一種險惡的微笑,然而很可愛,眼角彎彎的,撇出魚尾紋。⁵⁰

這種極其日常、可是很少在小說裏出現在女主角身上的病症,並非只是“象徵孟煙鸞的婚姻如便秘一樣有困難感與疼痛感”。⁵¹畢竟,“振保帶煙鸞去看醫生,按照報紙上的廣告買藥給她吃,後來覺得她不甚熱心,仿佛是情願留著這點病,挾以自重。他也就不管了”,⁵²她並未積極對症下藥,反而對這病有一些眷戀似的。

便秘是一種堵塞,煙鸞連說話的對象都被剝奪了,在婚姻裏確實是被堵塞住的;再者,婚姻的不愉快,來自丈夫、婆婆的要求,她無法完滿達到,換言之,是一種婚姻、親族、人際關係上的無能,因此受挫後反向封閉自我,而便秘就給了她理由,在浴室內她可以暫時把自己從無從應付的人際關係網中剝離出來,打造一個“自己的房間”。Virginia Woolf 提倡女性自由寫作的前提之一在於擁有“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很諷刺的,煙鸞因為便秘而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房間”,一個從家屋中暫時割出、給予她“歸屬”的空間;她無法如娜拉一樣出走,只能在日常生活裏以病作為保護傘,遁入滌污、如廁用的空間,在孤絕中休息,於自囚中反能呼吸,放下妻子、媳婦和母親的身份重擔。煙鸞雖然也受過教育,却是不能走到家庭以外、無法獨立生存的女性,在浴室裏,她的視野內剩下她自己,她凝視自身,看向肚臍眼——通常也被拿來形容那些只關心自我小事、目光淺窄的作品⁵³——却是小說裏她唯一能面對自己的時刻,多半時候,她都生活在他人的凝視與裁判裏。

煙鸞患病的情節後,小說安排振保意外發現妻子與裁縫原來有些首尾;也

50 《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頁170。

51 易小亮:《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小說的“病”婦形象研究》,頁4。

52 《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頁170。

53 張愛玲:《童言無忌》,《華麗緣》(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10年),頁122。

就是說，煙鸞雖然鬱悶、在家內沒有地位，却仍然運用其主婦的機敏，把這個壓抑她的家庭空間改寫為情欲空間，如同當年振保與嬌蕊一樣，都是利用丈夫不在家的時間進行。然而，這裏還是可以看出一組對照：嬌蕊最後決定出走、迎向愛情，煙鸞與裁縫的好事却就此停擺，煙鸞並未具備足夠勇氣脫離原來的環境。

受囚禁的女人在張愛玲筆下現身多次。散文《私語》寫得罪後母，被父親囚禁，看著“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牆”，感覺到“靜靜的殺機”；⁵⁴小說《半生緣》裏顯然以此為參照，塑造出全書最恐怖的情節：曼禎被姊姊、姊夫聯手欺騙，強暴後監禁。無論現實中的張愛玲，或小說裏的曼禎，最終都逃了出去。可是，自囚的煙鸞，能逃出去嗎？想逃出去嗎？可以逃到哪裏？研究者曾謂煙鸞這個角色具有“沉默、匱乏與哀傷的女性亞文化特質”，⁵⁵煙鸞從自囚中得到扭曲的“自由”，取得沉默與靜止的“正當性”，正是此一特質的佐證。

振保的腹痛霍亂疑雲，乃是因為情欲失禁而引發身體失禁（失去自制力）的可能；煙鸞的便秘則為身體堵塞，並反轉疾病帶來的不便，以此為保護傘，情願自囚。二者恰成對比。《紅玫瑰與白玫瑰》不僅呈現了題目所示嬌蕊與煙鸞這一組相反的女性形象，也帶出了振保與煙鸞看似相反、實則相類的生命困境。川嫦的肺病還能帶來“詩意的死”的幻想，當病癥發於腸胃，腸胃與消化、排泄的聯繫太近，給人形而下之感，在諸種身體器官的階序裏因而位置較低，很難被賦予詩意想象，更讓身體顯得只是身體。⁵⁶

四、乾荒失能的厭食/不孕身體

與張愛玲個人生平頗見呼應的《小團圓》，作品本身並未令張迷再溫“華麗

54 張愛玲：《私語》，《華麗緣》，頁 153。

55 林幸謙：《荒野中的女體——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 I》（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61。文中提出“女性亞文化”（female subculture），指“一種為了使女性屬於從屬地位，並設法將其永遠設於此從屬地位的一系列觀念、偏見、趣味和價值系統”，見頁 54。

56 《疾病的隱喻》，頁 22。

蒼涼”⁵⁷風格,反而顯得奇突、陌生,性描寫正是爭議點之一;⁵⁸在過往張愛玲小說中幾乎不曾見過的露骨痛苦的性描寫,與不無沉醉甜蜜的戀愛過程之間,構成巨大張力。小說裏,主角盛九莉多次通過他人眼光(最有力量的審視來自母親蕊秋)審視自己身體,多半時候是自卑的,偶然得到母親的護衛與讚美就記住許久;在與邵之雍的親密過程中則透露出一股異己感,初吻時感覺“這個人是真愛我的”⁵⁹隨即却是對方“一隻方方的舌尖立刻伸到她嘴唇裏,一個乾燥的軟木塞”⁶⁰的反感,察覺到對方的性衝動時是“有一天又是這樣坐在他身上,忽然有什麼東西在座下鞭打她。她無法相信——獅子老虎揮蒼蠅的尾巴,包著絨布的警棍”,⁶¹相對正面的性經驗只出現過一次,“有隻小動物在小口小口的啜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⁶²然而,接著一句却是說秋天晚上蚊子多,之雍“用手指蘸著唾沫搽在她叮的包上,使她想起比比用手指蘸了唾沫,看土布掉不掉色”,⁶³身體與商品在這聯想中被牽繫起來——故意地煞風景——而身體作為商品,正是張愛玲早期小說裏的貫通主題。⁶⁴

戰爭結束,由於邵之雍與汪精衛政府干係頗深,且戰後曾預謀兵變却失敗,遂出走避難。避難路上結識辛巧玉,還有之前到漢口辦報時認識的護士小康小姐,加上九莉,形成多角關係,情網剪不斷理還亂。九莉到溫州探視之雍,要求對方在感情上做出選擇,沒有得到確切答案,返回上海後陷入憂鬱:

57 論張愛玲生平與作品者,常見以“華麗”、“蒼涼”詞彙來描述,例如她去世後,台灣的皇冠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紀念文集就叫《華麗與蒼涼》。

58 許子東:《張愛玲晚期小說中的“愛情故事”》,收入氏著:《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頁25—26。

59 《小團圓》,頁167。

60 同上。

61 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09年),頁174。

62 《小團圓》,頁240。

63 同上。

64 《傾城之戀》裏范柳原說過“婚姻是長期的賣淫”一語,挑明了身體與商品的關係;或見張小虹:《戀物張愛玲——性、商品與殖民迷魅》,楊澤編:《閱讀張愛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在馬路上偶然聽見店家播送的京戲，唱鬚生的中州音非常像之雍，她立刻眼睛裏汪著眼淚。

在飯桌上她想起之雍寄人籬下，坐在主人家的大圓桌面上。青菜吃到嘴裏像濕抹布，脆的東西又像紙，咽不下去。

她夢見站在從前樓梯口的一隻朱漆小櫥前——櫥面上有一大道裂紋，因為太破舊，沒從北邊帶來——在麵包上抹果醬，預備帶給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裏。⁶⁵

當哀悼無法結束，糾結於失落的對象，與自我的幸福健康、持續存活相對立，在此憂鬱過程中，從對象轉向自我，而自我正是“由累積的失落之剩餘物所組成的”，⁶⁶與《花凋》裏川嫦在病後由於即將失落她曾擁有的一切，與世界的關係變得特殊而逐漸膨脹的自我相通。⁶⁷上段引文生動描繪了九莉抑鬱在心，食不下咽。以下引文則更清楚表明她患了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

她就靠吃美軍罐頭的大聽西柚汁，比橙汁酸淡，不嫌甜膩。兩個月吃下來，有一天在街上看見櫥窗裏一個蒼老的瘦女人迎面走來，不認識了，嚇了一跳。多年後在報上看見大陸飢民的事，婦女月經停止，她也有幾個月沒有⁶⁸。

這類病症是由於心理因素的驅動，食欲低落，營養不良，導致發生骨骼、心臟、生殖等方面的減退或功能損傷，一般認為該症候與大眾媒體過度宣揚單一美感

65 《小團圓》，頁274。

66 伍德堯(David L. Eng)、大衛·卡贊堅(David Kazanjian)著，鄭聖勳、翁健鐘譯：《哀悼殘存/持續》，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合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蜃樓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100—102。文中此處引用了Judith Butler發表於*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一書論點。

67 《花凋》，《第一爐香》，頁220。“川嫦本來覺得自己是個無關緊要的普通的女孩子，但是自從生了病，終日鬱鬱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觀念逐漸膨脹。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

68 《小團圓》，頁276。

形象有關。不過,九莉的厭食消瘦顯然不是爲了斧鑿修正身體形象,而是情傷使然。如同張愛玲小說人物屢屢通過鏡像獲致對自我的認識,如《第一爐香》薇龍從落地窗反光中看見自己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分”,⁶⁹《紅玫瑰與白玫瑰》振保從公共汽車的鏡子裏看見自己的臉在一陣“心平氣和的顫抖”⁷⁰後滔滔流下眼淚,旁證了他對嬌蕊壓抑的情感或者對自身當前生活的不滿,《花凋》川嫦從鏡子裏發現肺結核如何改變樣貌:“我怎麼會……會變得這麼難看了呢?”⁷¹等等,九莉也是自玻璃櫥窗上認識到身體的改變——沒有月經的“蒼老的瘦女人”,戀愛失敗似乎剝奪了九莉作爲“女性”的一切:青春、肉體、生殖力。

這樣乾荒的女性身體,在《小團圓》裏不是第一次出現。之雍好友日本軍官荒木的初戀情人,就是因爲“長期的精神與物質上的煎逼把人熬成了人乾,使人看著駭然”。⁷²九莉厭食乾瘦,也是精神上的煎逼而造成,且恰與韻事不斷、猶如患了情欲的貪食症(*Bulimia nervosa*)、愛失禁(沒有自制力)的之雍成對比,其情感泛濫程度甚至讓九莉說出:“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我不能與半個人類爲敵。”⁷³

與邵之雍分手後,九莉與燕山戀愛,期間又停經兩個月,以爲懷孕了:

他介紹了一個產科醫生給她檢驗,是個女醫生,廣東人。驗出來沒有孕,但是子宮頸折斷過。

想必總是與之雍有關,因爲後來也沒再疼過。但是她聽著不過怔了一怔,竟一句話都沒問。一來這矮小的女醫生板著一張焦黃的小長臉,一副“廣東人硬繃繃”的神氣。也是因爲她自己對這些事有一種禁忌,覺得性與生殖與最原始的遠祖之間一脈相傳,是在生命的核心裏的一種

69 《第一爐香》,《第一爐香》,頁33。

70 《紅玫瑰與白玫瑰》,《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頁166。

71 《花凋》,《第一爐香》,頁221。

72 《小團圓》,頁225。

73 《小團圓》,頁310。

神秘與恐怖。

燕山次日來聽信，她本來想只告訴他是一場虛驚，不提什麼子宮頸折斷的話，但是他認識那醫生，遲早會聽見她說，只得說了，心裏想使他覺得她不但是敗柳殘花，還給蹂躪得成了殘廢。

他聽了臉上毫無表情。當然了，倖免的喜悅也不能露出來⁷⁴。

“敗柳殘花”指情欲生活上放蕩或者被男人遺棄的女子，“殘廢”一詞意指傷害，也指向其自覺不完整，顯示九莉內在嚴重的毀壞感，從女性的名聲和身體兩端來加以否定，而且還是九莉審視自我而做出的判斷。子宮“殘廢”的修辭與想象，一方面是女體是否仍具備懷孕能力這一點，將直接影響傳宗接代，在父權社會裏尤其是釐定女性價值的關鍵點；另一方面，也由於不孕本身屬於內在性身體污名，雖然外在不見得能立即或隨時被視覺辨認出來，女性自身會格外意識到這種污名的重擔。⁷⁵《小團圓》裏曾以插敘手法描寫日後九莉定居美國，做過流產手術，故子宮“殘廢”的憂慮未必成真；⁷⁶而九莉對醫生這番話的直接解讀是“總是與之雍有關，因為後來也沒再疼過”，確實，九莉與之雍的性愛時常伴隨著疼痛⁷⁷，女方不一定投入，男方則異常執著：

那天之雍大概晚上有宴會，來得很早，下午兩點鐘就說：“睡一會好不好？”一睡一兩個鐘頭，她屢次詫笑道：“怎麼還不完？”又道：“噯，噯，又

74 《小團圓》，頁 319。

75 吳嘉苓：《受污名的性別、性別化的污名：從台灣“不孕”男女處境分析污名的性別政治》，《台灣社會學刊》，2002 年 12 月第 29 期，頁 138—141。

76 小說裏有一段插敘講九莉日後在美國懷了汝狄的孩子，打了胎。懷孕能力沒有真的被剝奪，但是這不是被宣告“子宮頸折斷”時的九莉能得知的。見《小團圓》，頁 178—180。

77 在小說描述中，只有一次九莉不感到疼痛，是她生日那天有機會住在邵之雍家裏且發生性愛。我同意這一次性愛是《小團圓》較為幸福的一次，可見林幸謙：《傾城式的戰火戀情：張愛玲的自傳主體版圖及其情/欲女性敘事》，氏著：《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41—143。除此之外，我比較不同意林文裏認為《小團圓》裏的情欲書寫是顯示“女性不再是情欲上的他者，或被壓迫的性別。而是具有自信心與浪漫愛情的完整的女人”。

“要疼起來了。”⁷⁸

“睡”是性愛的隱語，從“詫笑”來看，九莉顯然並不享受，甚至頗有與當下抽離開來的意味，“又要疼起來”顯示出他們的性活動常常伴隨著女方的疼痛感。另一次描寫則簡直是受罪：

越發荒唐可笑了，一隻黃泥罈子有節奏的撞擊。

“愛，不行的，辦不到的。”她想笑著說，但是知道說也是白說。

泥罈子機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來，沒完。綁在刑具上把她往兩邊拉，兩邊有人很耐心的死命拖拉著，想硬把一個人活活扯成兩半。

還在撞，還在拉，沒完。突然一口氣往上堵著，她差點嘔吐出來⁷⁹。

“荒唐可笑”、“機械性的”、“刑具”、“扯成兩半”、“嘔吐”等語，皆可看出女方並不投入性愛，其間的尷尬、不適，演變為長時間的折磨，男方也並不尊重、理會她的疼痛，所以“知道說也是白說”，乾脆沉默，讓性愛變成了以愛為名的受刑過程。

綜合以上，不愉快的性愛和分手後的厭食，使得九莉的身體成了醜陋且似乎不具孕能的乾荒身體。曾有學者引社會學家布萊恩·特納(Bryan S. Turner)論點指出，《小團圓》裏九莉生的四場病，“與其說是醫學疾病，不如說更是一種意識心態上的心理建構”，而因為憂鬱、厭食引發停經，則“顯示女性在社會上(而非生物學上)的脆弱性”。⁸⁰不過，這社會上的脆弱性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從前面兩段引文來看，厭食、停經、生殖器官病症諸端，都和九莉、之雍那一段情感經歷有關，且直接聯繫到性與疼痛；而在《小團圓》幾次性場面裏，他人的知覺或目光或隱或顯地埋藏其中。比如九莉總是擔心清晨之雍從她房中離

78 《小團圓》，頁 252。

79 《小團圓》，頁 257。

80 石曉楓：《隔絕的身體/性/愛——從〈小團圓〉中的九莉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 37 期，頁 195。

去，皮鞋聲太響，同住的三姑一定聽見了；或避難於日本人家中時，之雍仍舊要與她燕好，她也擔憂屋主一定是知道了，甚至是好友比比懷疑她與之雍同居；或歸國的母親聽見流言，闖入浴室檢查她的身體等。最後是來自科學的目光——醫生那不容置疑的判斷，側面證實了她失去了受孕生殖的能力。

不僅是男性的凝視，圍繞在九莉周圍的女性們內化了父權社會價值的視綫，也共同編織成一張網羅覆蓋下來，這些都是九莉身為女性在社會上所受的壓抑。⁸¹ 而之雍身為男性，却只需要面對情人的質問，而不需承擔無所不在的窺探與審判的壓力，公眾的議論甚至可以變成一張標籤，標明男人對於特定女人的所有權，“現在都知道盛九莉是邵之雍的人了”。⁸² 換言之，如果情感是試煉，九莉最後成爲“失敗”的女性，同時，之雍却證成了自己是四處留情的“成功”男性。

五、結 論

疾病書寫在文學裏的功能乃是“用以說明一個人和他周圍世界的關係變得特殊了，生活進程對他來說不再是老樣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當然的了”，⁸³ 肩負着將人類所遭遇之危機加以形象化的任務，並以“個人—疾病—社會”這樣的病理三角而存在，⁸⁴ 無論生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皆是如此。本文爲集中討論起見，聚焦於張愛玲小說裏因爲疾病而造就的病態身體上，以《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小團圓》爲主要探討文本。

《花凋》女主角川嫦由肺病繼發骨癆，身體衰敗而與社會隔絕，然而，這不等於她不需要社會的回饋；她悄悄離家，掙扎著出門，社會的目光回饋給她的却不是憐憫，而是駭怪。因此，川嫦患病後的失落是雙重的，一是打斷了往後人生可預見的發展，在小說裏主要是理想的婚姻，二是幻想中的詩意死亡被戳破

81 如前引林幸謙《荒野中的女體——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 I》一書中《張愛玲的女性書寫、性別政治與女體詩學》一文，就詳細闡釋了女性受壓抑的根源。

82 《小團圓》，頁 188。是邵之雍寫給九莉的信件內容。

83 維拉·波蘭特(Vera Pohland)著、方維貴譯：《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面》，《文藝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130—131。

84 同上。

了。小說從她因為情感而發熱的身體反應過渡到久病臥床的描寫，仿佛如同過往其他小說一樣將讀者帶向肺病的浪漫化；事實上，當她意識到社會解除了她個人在健康時應履行的種種義務或可享有的權利，且在對於傳染病的恐懼下⁸⁵，視其為不可碰觸、須排除的存在時，無法將疾病的醜惡就當作醜惡承受下來的川嫦，是在幻滅中度過剩下的人生的。

而《紅玫瑰與白玫瑰》則是參差對照了男性的病態身體與女性的病態身體。振保的霍亂腹痛恐懼與其欠缺自制的情欲冒險相應，而煙鸞在生活與身體上的雙重堵塞，乃至於必須躲在浴室裏，才可能擁有一個暫時的自我空間，放下一切女性必須負擔的身份重擔。悲哀的是，煙鸞暫時釋放自我的這個空間，仍是內含於家屋內的，藉著疾病，雖能打開自囚/自由的可能，却不可能永遠如此；她與裁縫外遇一事，似乎彰顯了她仍然渴望變化，不過，也容易被撲滅，並未發展為更進一步的掙脫當前生活困境的動能。

最後是《小團圓》裏盛九莉厭食、疑似不孕的乾荒身體，來自她作為女性在公私領域中受到的壓抑，並產生了憂鬱與自我厭惡；她的不快樂，來自童年至成年以後皆無法甩脫的那些審閱身體的目光。九莉在愛情失敗以後出現厭食症狀，與邵之雍宛如貪食症般的情欲履歷，形成相互詰辯、映照的一組存在；小說幾次聚焦描寫她在性事中身體疼痛、意識抽離，却無法得到對方的體恤，甚至在她邁入下一段感情後，使她承受女體殘廢的恐懼。

整體觀之，張愛玲在《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小團圓》裏呈現的病態身體，是鑲嵌在社會與文化的網絡裏的，包含了對於古典與現代文學裏疾病書寫的回應，也與民國時期上海疾病的社會史有所關聯，更呈現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壓抑。

(作者：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85 結核病菌在 1882 年時由 Robert Koch 發現。而在中國，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丁福保《衛生學問答》開宗明義提到“微生物”對衛生的影響，1908 年出版的小說《衛生小說：醫界鏡》裏已經提到病菌意義的“微生物”一詞。以上見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4 期，頁 24—27。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下)》。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
- 金宏達編：《回望張愛玲·鏡像繽紛》。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
- 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出版社，2004年。
- 林幸謙：《荒野中的女體——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 I》。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林幸謙：《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 易小亮：《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小說的“病”婦形象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 郁達夫：《郁達夫全集(五)》。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
- 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圖書公司，2013年。
- 許子東：《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
- 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52年。
- 張愛玲：《第一爐香》。臺北：皇冠圖書公司，1991年。
- 張愛玲：《流言》。臺北：皇冠圖書公司，1991年。
- 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09年。
-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短篇小說集二)》。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10年。
- 張愛玲：《華麗緣》。臺北：皇冠圖書公司，2010年。
- 楊澤編：《閱讀張愛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
- 鄧寒梅：《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疾病敘事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 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合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蜃樓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 鍾正道：《佛洛伊德讀張愛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年。

(二) 論文

- 戈散士：《冬》，《上海生活》，第3期第4版(1944年12月31日)。

- 王冬梅、孔慶林：《肺病隱喻與性別文化象徵》，《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 巴呂德：《上海霍亂流行之研究》，《中華醫學雜誌》，1944年第4期。
- 石曉楓：《隔絕的身體/性/愛——從〈小團圓〉中的九莉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
- 守常(李大釗)：《萬惡之原》，《每周評論》，第30號第4版(1919年7月13日)。
- 李蓉：《性別視角下的疾病隱喻》，《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
- 林幸謙：《重讀〈金鎖記〉：鐵閨閣與雙重人格的儒家瘋女》，《人文中國學報》，第5期(1998年4月)。
- 吳嘉苓：《受污名的性別、性別化的污名：從台灣“不孕”男女處境分析污名的性別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29期(2002年12月)。
- 周芬伶：《病恙與凝視——海派女性小說三大家的疾病隱喻與影象手法》，《東海中文學報》，第24期(2012年7月)。
- 宮愛玲：《疾病的阻隔與愛情化石的生成——論張愛玲小說疾病書寫的美學意蘊》，《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 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域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3月)。
-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創刊號(1915年9月)。
- 黃曉華：《前期創造社疾病書寫與現代人的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3期。
-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4期(2004年6月)。
-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
- 傅孟真：《所謂“國醫”》，《文化月刊》，1934年第9期。
-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社會的多個世界與“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
- 蘇青：《聽肺病少爺談話記》，《雜誌》，1943年第4期。
- 維拉·波蘭特(Vera Pohland)著、方維貴譯：《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面》，《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

二、英文

專書

René Dubos, *Mirage of Health*. New York: Harper, 1959.

Revisiting the Sickened Bodies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with Focuses on *The Withering Flower*,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Rose*, and *Little Reunion*

Yang Chia-hs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usan Sontag argues that illness is the internal spiritual status that becomes a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body, and is therefore a form of self-expression. There have been plenty of studies of Eileen Chang's (1920 – 1995) novels, and the discussion of narratives on illnesses in her works is not new. Cao Qiqiao,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depicted as a patient of tuberculosis with symptoms of hysteria, anorexia and uterine diseases, has long been a focus of recent scholarship. These are certainly common illnesses foun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essay, however, is an attempt to discuss Chang's writing on illness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studied.

Hence, the present research focuses on illnesses such as tuberculosis in *The Withering Flower*, cholera and constipation in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Rose*, and anorexia and dyspareunia in *Little Union*. It explores three types of morbid bodies in Chang's novels: exhausted and ugly bodies; confined and self-imprisoned bodies; and internally injured and self-abandoned bodies; and discusses their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their aesthetic function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is essential in the discussion of narratives of illnesses because by means of its formidable power illness functions in implying or indirectly depicting the

protagonist's changes i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as well as her life dilemma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ertain encounters and certain diseases. Making use of historical sources, the analysis of texts may become more in-depth; we see that the morbid bodies in Chang's novels by no means exist in isolation but are imbedded in a contextual picture of history, society, and gender.

Keywords: Eileen Chang, morbid body, narratives of illness, gender